

# 2010年后中国大陆沈从文研究的新动向

罗勋章<sup>1</sup> 齐藤大纪<sup>2</sup>

(1.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2.富山大学 人文学部,日本 富山 9308555)

**摘要:**2010年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因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步迈进,呈现出新的风貌。沈从文作为作家与学者的个体价值,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场域影响,沈从文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发与影响,沈从文作为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等,都是过去没有深入展开或者没有展开研究的。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性与关注度虽不及鲁迅,但远远超越了郭茅巴老曹;沈从文的被研究度与张爱玲虽大体持平,但沈从文更被主流研究者所关注。

**关键词:**沈从文研究;个体精神;新动向

**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5-0050-06

经过30年的研究积累,沈从文研究逐步从边缘进入中心,而人们对沈从文的认知,不仅逐渐从文学跨入文化领域,且不断衍生的新方法、新视角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也使沈从文研究视域愈加广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以及“乡下人”与“现代性”等,“这些关键词几乎贯穿了沈从文研究的始终,且构成了‘沈研’现在的整体模态和基本走势,也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沈研’情结以及人们反复研究的内在张力”。<sup>[1]</sup>2010年以后的沈从文研究,既是在此学术基础上的深入,更因全球化及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步迈进,呈现出新的风貌。沈从文作为作家与学者的个体价值,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场域影响,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启发与引领,沈从文作为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等,都是过去没有深入展开或没有展开研究的。

截止2017年3月,在中国知网以“沈从文”为主题关键词检索到的研究论文有2258篇,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核心期刊刊载的文章为619篇。以“沈从文”为篇名关键词搜索到的研究文章为1252篇,核心期刊368篇。此期中国现代文学重点作家研究情况,按作者搜索结果为:鲁迅研究12116篇,核心刊载4266篇;郭沫若研究2272篇,核心刊载603篇;茅盾研究1531篇,核心刊载564篇;巴金研究1047篇,核心刊载238篇;老舍研究

1603篇,核心刊载410篇;曹禺研究1147篇,核心刊载349篇;张爱玲研究2568篇,核心刊载554篇;钱钟书研究967篇,核心刊载228篇。此期中国现代文学重点作家研究,按作者篇名搜索结果为:鲁迅研究5679篇,核心刊载2341篇;郭沫若研究973篇,核心刊载241篇;茅盾研究467篇,核心刊载164篇;巴金研究463篇,核心刊载105篇;老舍研究752篇,核心刊载211篇;曹禺研究469篇,核心刊载136篇;张爱玲研究1563篇,核心刊载329篇;钱钟书研究279篇,核心刊载81篇。上述数据显示,沈从文研究在中国大陆的重要性与关注度虽不及鲁迅,但远远超越了郭茅巴老曹;沈从文的被研究度与张爱玲大体持平,且更被主流研究者所关注。

## 一、生平研究:凸显沈从文后半生精神与思想存在

沈从文研究中对沈从文生命前期的探究,继金介甫及凌宇的扛鼎之作后,曾出现很多评传,2014年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的出版,则使沈从文生平与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张新颖有关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肇始于1997年的《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相对以往的传记或评传,《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的特点有二。一是以历史叙述方法陈述沈从文建国后的心灵历

程。“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sup>[2]</sup>实际上,在沈从文自身文献基础上,张新颖还融入了反映同时期文坛状况的大量史料,如建国初期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沈从文小说的评价,从而呈现出了一个更客观的沈从文。张著中论及王瑶等文学史家对沈从文的评价时,持论基本公允。此外,广泛的资料收录也增强了该书的分量。如1962年8月,华盛顿大学的施友忠发表于伦敦《中国季刊》1963年春季号的《摇旗呐喊者和逃避主义者: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一文,讨论了沈从文的旧体诗及其从事文物研究的选择。这是西方学术界最早讨论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的论文,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精神活动的叙述,凸显出个体生命与时代摩擦时的韧性与强大。这正是这部书的意义所在,如其所述“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sup>[3]</sup>。书中材料大多录自沈从文的书信与其他史料文字,叙述文字也呼应了沈从文的文字,散文化的表达有着极强的诗意。与此相对照的是李扬的《沈从文的家国》。这是继2006年作者完成《沈从文的最后40年》后的姊妹篇。该著从沈从文家国情怀的视角来组织材料,针对沈从文后期思想及人际交往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材料,如对沈从文与郭沫若、丁玲、萧乾、范曾等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注意到了沈从文的传统文化心理,可惜书中的叙述没有体现出足够的史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心态、立场——华北革大时期的沈从文述论》一文,是对沈从文1949年以后思想转变关键期精神发展的梳理,但其只梳理了沈从文在华北革大改造的种种不适应表现,缺乏独立的视野和结论。

沈从文的自杀及转型,是其前后两段生命的分界点。围绕这分界点的评论虽多,但大多泛泛而谈,惟李斌的《沈从文与民盟》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它通过对历史缝隙中隐伏史料的发掘,颠覆了读者对沈从文自杀这一事件的刻板印象。李斌指出,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虽曾被闻一多等劝说参与过民盟的活动,但终未加入民盟,而闻一多牺牲时,沈从文却未发声;沈从文与民盟由于认知不同,一直存在矛盾,而闻一多与沈从文的学生、民盟重要成员王康

(史靖)的《沈从文批判——这叫从现实学习吗?》一文,才是真正导致沈从文精神高度紧张的原因。<sup>[4]</sup>对于将郭沫若作为党的符号与沈从文的关系,以及我们对沈从文内心世界的猜度而言,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而李斌的《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一文,则带有情绪化倾向。李斌指出,1946—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牵涉到国共双方,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报刊杂志等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各种势力,更涉及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相关实践,对当下知识分子思索相关问题仍具现实意义。<sup>[5]</sup>这一视点高屋建瓴,但该文却未能从沈从文的语言表述风格去解读沈从文。沈从文关于闻一多的解说,“对于能改变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愚人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这里的“愚人”,按照论者所言当为“反动派”。《沈从文全集》中已将此改为“反动派当权者爪牙一击”。其实这里有一个话语风格问题。语言的表述背后是思维方式,沈从文的文学表述与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表述,不能简单用同样的意味加以阐释,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沈从文是没有阶级思维的。这一点,我们从沈从文在华北大学的检查报告的蹩脚表述中即可明白,不过李斌的文章,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审美化的沈从文所面对的现实的复杂性。解志熙则通过对各种文献所呈现的沈从文文学行为的心理分析,大胆指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末的自杀,并非由于政治原因,而是源于家庭与个人心理,所谓政治原因不过是一种便于社会接受的修辞而已。<sup>[6]</sup>这一说法未免有些惊世骇俗,但该文因为建立在新近收集的很多沈从文佚文的基础上,对于沈从文的生平研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二、书信研究:去蔽祛魅,释读沈从文的文学交际与文学生产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书信,既是特殊的文学文本,也是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2003年《沈从文全集》出版后,借助沈从文的书信探寻沈从文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俞汝捷《沈从文致姚雪垠信》、吴永平《也说沈从文的襟怀》分别介绍了沈从文对姚雪垠创作著名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教谊,成为我们评价《李自成》创作经验的重要参考。梁小娟《论沈从文的干校书信和干校诗》研究沈从文下放咸宁后的乡土经验,以及在这种乡土经验刺激下的诗歌创作。这篇文章有一

个特别的视点,即对沈从文晚年创作的干校诗的关注,为干校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作者认为,书信中沈从文自我精神与审美意识面临的特定历史境遇中的挑战与尴尬,烛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经验。<sup>[7]</sup>卢军《从书信管窥沈从文撰写张鼎和传记始末》、刘永春《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活动概述》、卢军《从〈沈从文书信〉解读沈从文与胡适关系》等,着眼于沈从文的创作构思以及发表的整体脉络,为廓清沈学迷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学现场证据。<sup>[8]</sup>李玮《5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守望》认为,由沈从文及其作品在50年代的被否定,而认为沈从文的文学生命就此结束的观念是错误的。<sup>[9]</sup>沈从文50年代的书信,显示出一种建设的文学批评观、写人的文学创作观及有情的审美艺术追求。沈从文50年代虽基本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书信中继续守望文学。信中大量优美的抒情、写景、记人片段和外向扩张的情感,使他的书信突破了私语写作的个人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是“潜在写作”的重要一支。

沈从文与友人的书信,将在很大程度上开拓沈学研究空间。张新颖一直到《沈从文全集》出版,拥有了大量的书信材料后,才真正开始启动《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写作即是明证。书信研究者任葆华在写出《沈从文与赵树理》《沈从文与老舍的疏离与遥望》《沈从文看文学史叙述中的自己》《沈从文书信中的郭沫若》《沈从文的另一面》《沈从文与周扬》《沈从文评说冰心其人其作》等多篇书信研究文章后,发表了《关于沈从文书信研究的设想》一文,认为沈从文的书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其书信研究将开拓沈从文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可能成为未来沈从文研究获得突破的生长点;并且对未来沈从文书信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路线图,认为作家关系、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等应是书信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应从文本细读出发,整体观照,同时参阅他人的文字材料。<sup>[10]</sup>

文人书信既体现了双方其时其地的思想情感状态,是一种表达双方对于文学的见解和领悟的文学互动方式,也是一种考察双方文学交际、文学生产等文学活动的重要参考材料。在作家中心、作品中心的研究钝化之后,书信研究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深度认知,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 三、版本研究:考释源流,还原历史中的文本

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跨越了近七十年的时

空,阅读视野的变迁,意识形态话语的异动,使版本修订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此一时期,有关沈从文作品版本研究的文章很多,以罗宗宇、曾婷的《论小说〈边城〉的当代传播》,李宗刚、李国聪《作家全集需注重对作品原貌的呈现》,彭林祥《〈从文自传〉的版本问题》比较有代表性。《论小说〈边城〉的当代传播》是《边城》版本史料信息的集合体。该文全面介绍了《边城》出版后的传播情况,分为五个部分:不同时期的《边城》小说(含插图等)版本,《边城》的海外译介版本,《边城》的电影改编状况,《边城》的大中学文学作品选或语文教材的收录情况,《边城》的代表性评论文章及文学史的评价情形。<sup>[11]</sup>李宗刚、李国聪和彭林祥的文章在讨论版本时,都指出了《沈从文全集》收文不慎的问题;不过,前者指向全集编订中对原始版本的忽视,后者则重在版本变异因素及好坏所产生的价值分析。《作家全集需注重对作品原貌的呈现》以《沈从文全集》收录的演讲稿《短篇小说》为例,强调了原初版本的重要性。文章通过沈从文回忆初次上课时一段文字的改动,以及有关胡适一段文字的删减,提出了影响版本的三个因素:多次叙述的模糊与偏差,时代政治因素,主体成熟过程中精神认知的变化。“通过对《沈从文全集》所收录《短篇小说》的校勘,可以看到,在一些作家全集中,版本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作家思想的解读以及文学史的书写。”<sup>[12]</sup>全集的编校不仅要原始版本有着清晰的呈现,而且对后来的修订版本也应予以准确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走进历史现场,在文学史书写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规律。文章对沈从文《短篇小说》删减的分析,切中肯綮,非常精彩。彭林祥《〈从文自传〉的版本问题》认为,《从文自传》修改六次,计有良友本、开明本、人文本、选集本、文集本等。作者认为,文集本《从文自传》最为全面,全集应选文集本入集,《全集》却简单地以开明本编入有些欠妥。这与李宗刚的观点恰恰相反。

此期有关沈从文佚文的发掘也是一个亮点。裴春芳《经典的诞生》,辑录了此前发表的沈从文《摘星录》的多个版本佚文。该书虽是对京派文学作品的研究,但是对沈从文叙事话语的研究占了一半的篇幅。解志熙、裴春芳、陈越的《沈从文佚文废邮再拾》,辑录有沈从文书信、读书笔记及杂文14篇。对于这14篇文章,解志熙在《遗文疑问待平章》一文中,分别以“友谊与爱情的遗迹”和“爱国与爱欲的焦虑”给予了诠释疏解。<sup>[13]</sup>这些文章结合2009年前后

寻找到的沈从文佚文,对于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沈从文40年代的思想认识以及建国后的转型的认识,都意义重大。解志熙与裴春芳等人对沈从文40年代发表的杂文及书信的发掘,于沈从文40年代后期思想的转变研究极具价值。其他的版本研究涉及《摘星录》《萧萧》《看虹录》《水云》《绅士的太太》等作品。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考辨《摘星录》一文所涉及的人物原型,征引丰繁,辩说细致。该文可以算是对裴春芳等人解读沈从文的质疑,对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将版本分析及创作阐释生活化的研究倾向,具有振铎警策的意义。

#### 四、物质文化研究:沈从文物质文化研究历程与转型

进入21世纪后,沈从文在物质文化领域的贡献与影响,要求学术界对此做出相应的回应。张鑫、李建平《近三十年来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述评》对前期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就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指出:方法论的提炼与总结,文化成果的推广与传承,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及未完成课题的续接研究,应该是今后的方向。<sup>[14]</sup>2010年后,有关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依然不够丰富,但有一些新的思想颇具启发性。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的服饰研究历程》系列文章,在介绍沈从文的人生履历后,解释了沈从文爱好文物的原初动力。作者以见证人身份,细数了沈从文一生执著于文物研究的历程,为人们理解沈从文提供了很多具体材料,但其文章缺乏新观念与新思想。张新颖在《“沟通人我连接历史”而长久活在历史中》一文中,通过重新研读《从文自传》等史料,认为沈从文“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文物和文物,不是一个孤立的东 西,它们各自蕴藏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工艺器物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普普通通的无名者相接相续而成”,正是这种沟通,使得沈从文虽转型却不迷失。<sup>[15]</sup>陈彦《‘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认为,受经济条件限制的沈从文,其所收藏的有别于传统金石字画的文物,使其拓展了艺术品的谱系。沈从文注意到“这些较偏远的地区,在日常器具上即可见出古典传统区域性风格的混合。

从了解历史目的出发,那小物事的确有极高认识与研究价值”<sup>[16]</sup>。作者认为,沈从文留心细物,本是为爱欲转移,却由于耐心与爱好,获得了许多有关物的知识,进而再由物到人升华为抽象的美。沈从文在物的羈縻中体会到,美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同时亦深具历史性。这种体悟,使沈从文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法,那就是沈从文对其所熟知的地方人物、地方生活深描细绘的精神刻画与历史叙写。陈彦的分析深刻细密,是解释沈从文转型物质文化研究的最有创建的表述。

随着烟雨长河在凤凰古城以印象山水的形式演出,基于沈从文文学作品的文化创新开发,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吴琼的《基于沈从文文学作品的湘西旅游开发研究》,安宁等撰写的《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刘晨《文学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凤凰古城为例》,以及梁子玉以凤凰旅游发展为案例所做的《文化变迁与旅游发展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将沈从文的文化效应作为研究的重点。正如《文化变迁与旅游发展研究》指出的:“许多人都是通过沈从文的《边城》才知道在湖南湘西有一座叫凤凰的古城。凤凰因沈从文和《边城》而出名。”<sup>[17]</sup>这些文章尽管缺乏深度,但从物质文化衍生研究视角看,其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

#### 五、创作研究:乡土之外观照沈从文的乡土叙事

在新世纪后形成高潮的沈从文文学创作研究,基本上囊括了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等多个层面。坂本达夫的《试论沈从文小说中有关动物意象的修辞运用》,从人物塑造、空间情境以及精神层面出发,对沈从文的动物修辞小说,进行了多角度文本综合分析。与之相应的是,在众多的形象分析文本中,意象分析成为一种研究方法,比如以白菜和菊花意象分析作者写作立场和革命态度的《从白菜和菊花意向看沈从文〈菜园〉》,还有分析沈从文笔下的鱼意象与苗族鱼图腾关系的《沈从文小说中的鱼意象》等。在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中,不断有学者运用新的学术理论进行思考。王晓文的《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认为,边地的独特空间,产生了沈从文众多小说中凄美的爱情故事。<sup>[18]</sup>何小平的《论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论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则是在人类学理论被广泛征用的学术语境下展开的。在《论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中,作者认为,《湘西》高度体现了沈从文理解阐释湘西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融

合,以及文化相对观与整体观的结合。<sup>[19]</sup>《论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则认为,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的文本,包括表达文化思考的文学文本,以及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民族志文本),二者共同指向对湘西及现代都市的文化思考,两类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正是这样一种视野,使沈从文能站在国家整体文化角度,去关注思考湘西文化和都市文化。<sup>[20]</sup>

与前述对乡土书写的本体认知不同,张新颖通过对当代作家余华、贾平凹以及王安忆的写作分析,指出了沈从文在当代作为传统的价值。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中,作者认为,余华《活着》中的福贵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手(《1934年1月18日》)其实是一样的人,不追问活着之外的意义而活着,忠实于活着本身而使生存和生命自显庄严;而中国当代乡土衰败的趋势,则是沈从文没有写出来的长篇小说《长河》的延续,《长河》所书写的湘西乡土,是一个风雨欲来即将失落的边城,贾平凹的《秦腔》呼应了《长河》写出来的部分和虽然未写但已经呼之欲出的部分,其《古炉》则干脆从《长河》停住的地方继续往下写,呼应的是《长河》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贾平凹的困窘在于乡村衰落了,“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实际上,这种思考在沈从文那里已经开始了,不过贾平凹更理性;而王安忆的《天香》则可对应沈从文对文物的态度,“天香园绣”的历史,也就是沈从文所投身其中的物质文化史的一个支脉,沈从文以这样的蕴藏着普通人的生命信息的历史为他心目中“真的历史”,庄敬深切地叙述这种历史如长河般不止不息的悠久流程,相通的感受和理解,同样支持着王安忆写出“天香园绣”自身的曲折、力量和生机。<sup>[21]</sup>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他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力图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从文学叙述中寻找思想的衍化与迁移的努力。这种努力,刚好是今天的研究与批评所缺乏的。

已有的有关沈从文的乡土叙事研究,一直强调其叙事的本质与特征,而较少跳出乡土范围。张洁宇的《京派:未尽的学院派追求》以沈从文的文学主张为例,讨论了京派与海派的特质。他认为,京派与海派是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派别,其对于京派的乡土想象以及海派的殖民与资本二重性等的特征描述,忽略了京派纯粹独立的纯文学立场、醇正古雅的艺术风格,以及主题上对人性与自然的强调这些思想价值与艺术追求背后的学院情结,而沈从文挑起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即受到学院派的影

响。<sup>[22]</sup>这种对京派内涵精神的分析,使我们获得了对沈从文最能体现京派风格的乡土书写的新认知,深化了吴世勇《影响沈从文创作的六因素(乡土、都市、出版、大学、女性、政治)》一文中的说法,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了,《边城》这样的乡土书写,何以会呈现出那么美好的生命境界——以学院派视野观照乡村,使其形构的现实获得了想象的升华。谢有顺的《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则从小说叙事伦理角度讨论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是模糊叙事,它往往不判断是非,不决断善恶,不给生活下结论,也不做良知的裁判,而是尽可能地去理解一个人,理解他生命中一切的感受和变故。去理解,而不是去决断,这是文学叙事最基本的伦理之一”,“沈从文怀着伤感写暴力,不是为了显示暴力多么强大无阻,而是为了拯救,为了看,他在小说里想象了无边的爱。因为只有爱,才能承担和解冲突的重担。只有爱,才能让暴力低下不可一世的头颅。沈从文终究还是要把爱存放在乡村,因为天尽头的虫鸣鸟叫,松落、雪飘、风吹,最能撮合肉身与灵魂的相遇,将美、善、爱合而为一,赞美没有恶意的生命景观,开启旷野里的自在呼吸,这一直是沈从文的写作伦理”,沈从文“不搁置革命的激情,但对革命的激情有迂回的看法,他的作品,暗藏恐惧、怀疑、不安,沈从文想象了爱的力量,用以抵御暴力的肆虐摧残”。<sup>[23]</sup>任晓兵的《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为沈从文乡土叙事的价值及动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在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以及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使他理性地接受了自己的苗族身份;其在以有关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中心的同时,以苗族族群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思考重造民族文化,以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沈从文在青岛生活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已越过“民俗书写构建苗族集体认同记忆”的初级层面,上升到了整体建构中华民族崭新形象的高度。<sup>[24]</sup>

上述研究集中地体现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代文化发展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与互动。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不断融入世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弱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彰显,也渗透到文学研究中来。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形象建构,以及地域文化的价值凸显,也影响到人们对沈

从文及其创作的认知,使沈从文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新材料的出现,催生了新的研究平台。文学研究无非观念的创新,材料的增添,以及方法的创新几条途径。《沈从文全集》中大量书信的面世,极大地拓宽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也拓展了沈从文研究的空间。书信对文学创作原生态的场域还原,深化了我们对其创作的认知。经过几年的酝酿,2010年后沈从文书信研究正式走向研究前沿。此前虽然有金介甫、凌宇通过采访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但沈从文书信的出版,使得研究平台化,从而推动了沈从文研究。其二,新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从学术价值来看,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无疑是一个高峰,其研究的方法与理念是当然需要传承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读懂沈从文的情怀,才有可能续接他的文化遗产。沈从文借助切实地把玩文物而建构起来的文物研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生活的衍生品,同时又吸纳了西方的执著,因此沈从文完成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不是李渔的《闲情偶寄》。它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点,用现代的所谓学术惯例去处理沈从文留下的遗产,无疑是隔靴搔痒。正是新的时代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多样性,才使得一些学者有可能参透沈从文的转型。因此,在沈从文研究中,可以找到一条打通现代与中国传统的道路。与此相应的是,对沈从文精神世界的表征化与景观化叙事,会成就新的沈从文文化。如何从文化视角去解释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今日现实对文学的叩问。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与凤凰、茶洞的景观生产,会成为沈从文研究的一个生长点。其三,新的时代语境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对个体价值在历史中的地位的重估,是张新颖的《沈从文后半生》的主题之一。这一认知打上了时代烙印。同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的荒原化已经不再是感觉与想象而是现实。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成为进入现代中国人往昔梦想的桥梁,土地、景观、民风的巨大变迁,愈发凸显出沈从文创作的乡土价值。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现代文学中最具人类学意义与价值的写实,又是文学化的乡土存在,是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兼备体,因此,沈从文的湘西地理志叙事及民族文化叙事,还会被人们进一步关注,其研究会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与快速转型,也赋予了沈从文这样深描细绘的乡土以存在的重要性。为建构丰富多样的审美文学空间,中国现代作家在历史的前行中,表达出了

对文化中国和文学中国的深切思虑之情,尽管每个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但是其都共同体现出一种深切的民族认同感。这种建构方式,体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那种面对时间流逝而捕捉不住的焦虑感。这些思想,会在以后的沈从文研究中逐步显现出来。

#### 参考文献:

- [1]赵学勇.1979—2009:沈从文研究的几个关键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6).
- [2]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 1948—1988[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3]张新颖.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J].当代作家评论,2012(6).
- [4]李斌.沈从文与盟盟[J].文学评论,2016(2).
- [5]李斌.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7).
- [6]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中、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12).
- [7]梁小娟.论沈从文的干校书信和干校诗[J].江汉论坛,2011(10).
- [8]卢军.从书信管窥沈从文撰写张鼎和传记始末[J].文学评论,2011(6).
- [9]刘永春.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活动概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 [10]任葆华.关于沈从文书信研究的设想[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2013(5).
- [11]罗宗宇,曾婷.论小说《边城》的当代传播[J].创作与评论,2015(20).
- [12]李宗刚,李国聪.作家全集需注重对作品原貌的呈现[J].理论学刊,2014(6).
- [13]解志熙.遗文疑问待平章[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10).
- [14]张鑫,李建平.近三十年来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述评[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 [15]张新颖.“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6).
- [16]陈彦.“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J].文学评论,2015(4).
- [17]梁子玉.文化变迁与旅游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7.
- [18]王晓文.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
- [19]何小平.沈从文《湘西》民族志的书写[J].民族文学研究,2013(3).
- [20]何小平.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 [21]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J].南方文坛,2011(6).
- [22]张洁宇.京派:未竟的学院派追求[N].文艺报,2015-09-30.
- [23]谢雨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D].复旦大学,2010.
- [24]任晓兵.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